
南京红土桥出土的南朝 泥塑像及相关问题研讨

王志高 王光明¹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 南京红土桥出土的一批南朝泥塑像,是六朝都城建康地区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据分析,遗物出土地点与南朝廷兴寺遗址有关。从制作工艺角度观察,红土桥南朝泥塑像经彩绘、施釉妆奁和入窑烧固等工序,与同时期百济泥塑像相似,属于同一制作工艺技术传统,而与北朝泥塑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反映了南朝佛教文化对百济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南京红土桥 南朝泥塑像 延兴寺 制作技艺 百济 北朝

【中图分类号】: K879.3 **【文献标识码】:**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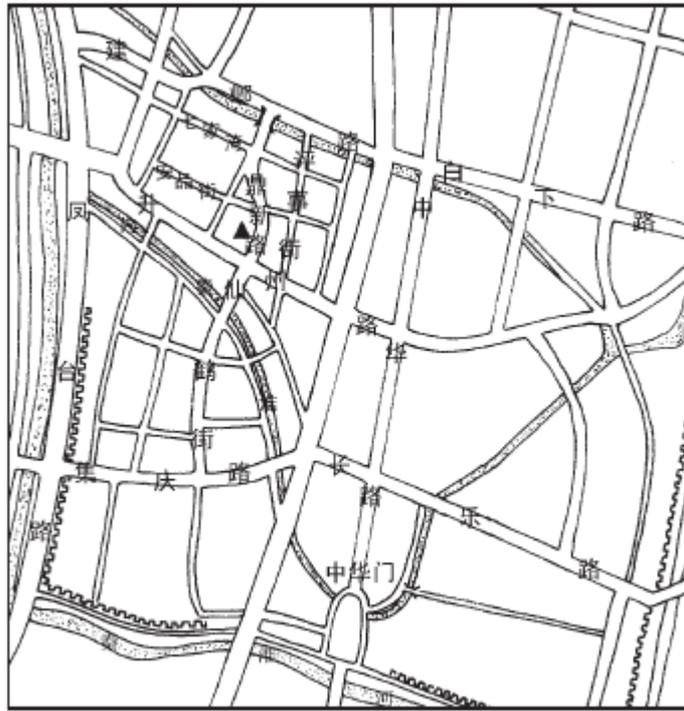
2002年3月下旬,南京市建邺区国税局在位于南京城西南隅的鼎新路南侧的建邺区国税大厦工地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两座宋代古井和一座南朝时期的灰坑。随后,由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对发现的古代遗迹进行了清理,其中南朝时期灰坑中出土一批罕见的泥塑造像,造像虽均残损严重,却是南朝都城建康地区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遗物出土地点,据文献记载分析,与南朝廷兴寺有关。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南朝都城建康佛寺分布、佛寺泥塑像的制作技艺以及南北朝佛教文化交流、南朝佛教文化对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百济的深远影响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就这批南朝泥塑像及其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道。

一 泥塑像出土状况及伴出遗物

出土泥塑像的南朝灰坑位于此工地建筑基坑的南壁下中部,东距鼎新路约 57 米,南距升州路约 65 米(图一)。灰坑开口距今地表约 3.1 米,仅局部在基坑之内,延伸至基坑之外的部分未能清理。已清理的基坑内的灰坑部分平面形状不太规整,略呈半椭圆形,东西径约 2.1、南北径约 1.5 米,坑底东深西浅,残深 0.5~1.5 米。坑内满填较多的残碎泥塑像及少量的烧土块、碎砖瓦、瓷器残片等。泥塑像残件大小不一,有 80 余块,其中可辨形制者有 30 余块,大体分头像及身体残像两类,均通体烧结呈砖红色,以下分类介绍。

¹**作者简介:** 王志高(1968~),男,南京市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六朝文物考古、南京古代史及 3~6 世纪东亚物质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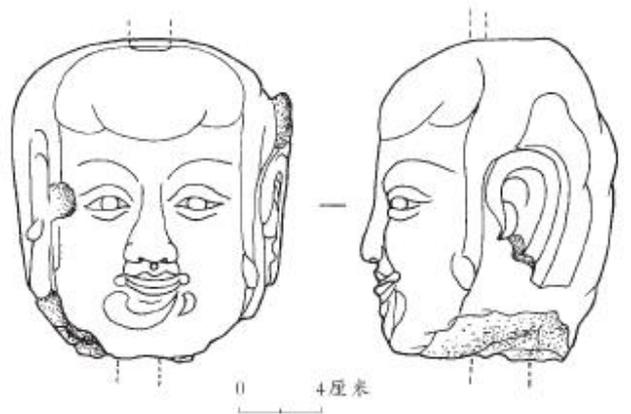
王光明(1976~),男,南京市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南京地区古代史及文物考古。



图一//南朝泥塑像出土位置示意图



图二//头像照片(H1:1)



图三//头像(H1:1)

头像残件见有 2 件, 一件为残头像, 另一件仅存发髻。

标本 H1:1, 残头像。面相丰满, 五官端正, 大圆眼, 高鼻, 微笑。前额饰连弧形短发, 残存左耳, 大耳下垂。外耳廓局部尚存红色彩绘痕迹, 内耳廓局部施一层较薄的黄釉。头顶前部有一横扁长条形插孔, 原来可能戴冠。头像中空, 颈底有一近方形孔, 似以方形木杆为骨连接头部与躯体部分。耳部系单独捏塑后粘接于头侧, 粘接痕迹明显。通高 15.8、宽 13.6 厘米(图二、三)。

标本 H1:9, 发髻残件。发辫规矩整齐, 高低错落, 转角生硬分明。外表有红色彩绘痕迹。两侧及中央顶部有插饰物的小孔, 髻底还有一个“凸”字形插孔, 用于连接头部。高 8.6、宽 8.8 厘米(图四、五)。

余者皆为包括衣纹在内的身像残块, 择其代表者介绍如下:

标本 H1:3, 上身残块。存上半身及双臂, 背部外表局部尚存彩绘痕迹。内腔中空, 从内壁痕迹看, 原以圆管状芦苇一类植物杆茎束扎作为内芯。残高 22.6、残宽 25.2 厘米(图六)。



图四//发髻照片(H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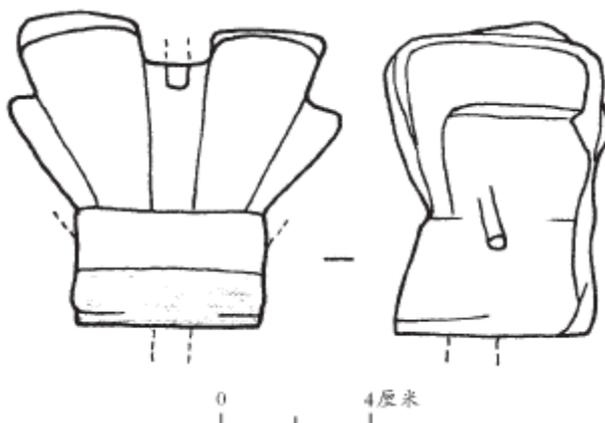
标本 H1:6, 躯体残块。内腔见有两束芦苇状芯骨。残长 22.4、残宽 20.8 厘米(图七:1)。

标本 H1:7, 躯体残块。外表局部尚存红、白两色彩绘痕迹。内腔中空, 从内壁痕迹看, 原有两束芦苇状芯骨, 每隔 3~10 厘米横向紧扎。残高 52.8、残宽 19.2 厘米(图七:2)。

标本 H1:8, 躯体残块。外有一“天”字形刻划符号。胎表陶衣外彩绘完全剥落。内腔中空, 从内壁痕迹看, 原有两束芦苇状芯骨, 均每隔 6~8 厘米横向扎紧。残高 50.8、残宽 22.8 厘米(图七:3)。

标本 H1:2, 躯体残块, 外有黑、红、白三色彩绘痕迹, 局部施褐釉。残长 17、残宽 14 厘米(图七:4)。

标本 H1:5, 上身及一侧肢残块。残长 16.4、残宽 14.2 厘米(图七:5)。



图五//发髻(H1:9)



图六//泥塑上身残块(H1:3)

标本 H1:27, 躯体残块。内腔见一圆管形芦苇状植物杆茎束扎的芯骨痕迹。残高 15、残宽 10.8 厘米(图七:6)。

标本 H1:25, 躯体残块。一面较平整, 中央有一长条状凸起。内腔中央有一横扁长方形插孔。残高 24、残宽 29.6 厘米(图七:7)。

标本 H1:22, 躯体残块。局部见施清晰的黄釉痕迹。残长 6.8、残宽 5.5 厘米(图七:8)。

标本 H1:13, 躯体残块。内腔见有圆管形芦苇状植物杆茎束扎的芯骨痕迹。残长 12.2、残宽 7.2 厘米(图七:9)。

标本 H1:21, 衣纹残块。局部有红、白两色彩绘痕迹。残长 18、残宽 7.4 厘米(图八:1)。

标本 H1:10, 衣纹残块。有条状衣纹。外胎似施一层白色胎衣, 其外局部尚存红色彩绘和施黄釉、绿釉的痕迹。残长 19.4、残宽 14.2 厘米(图八:2)。

标本 H1:20, 衣纹残块。局部尚存彩绘痕迹。残长 7.2、残宽 7.2 厘米(图八: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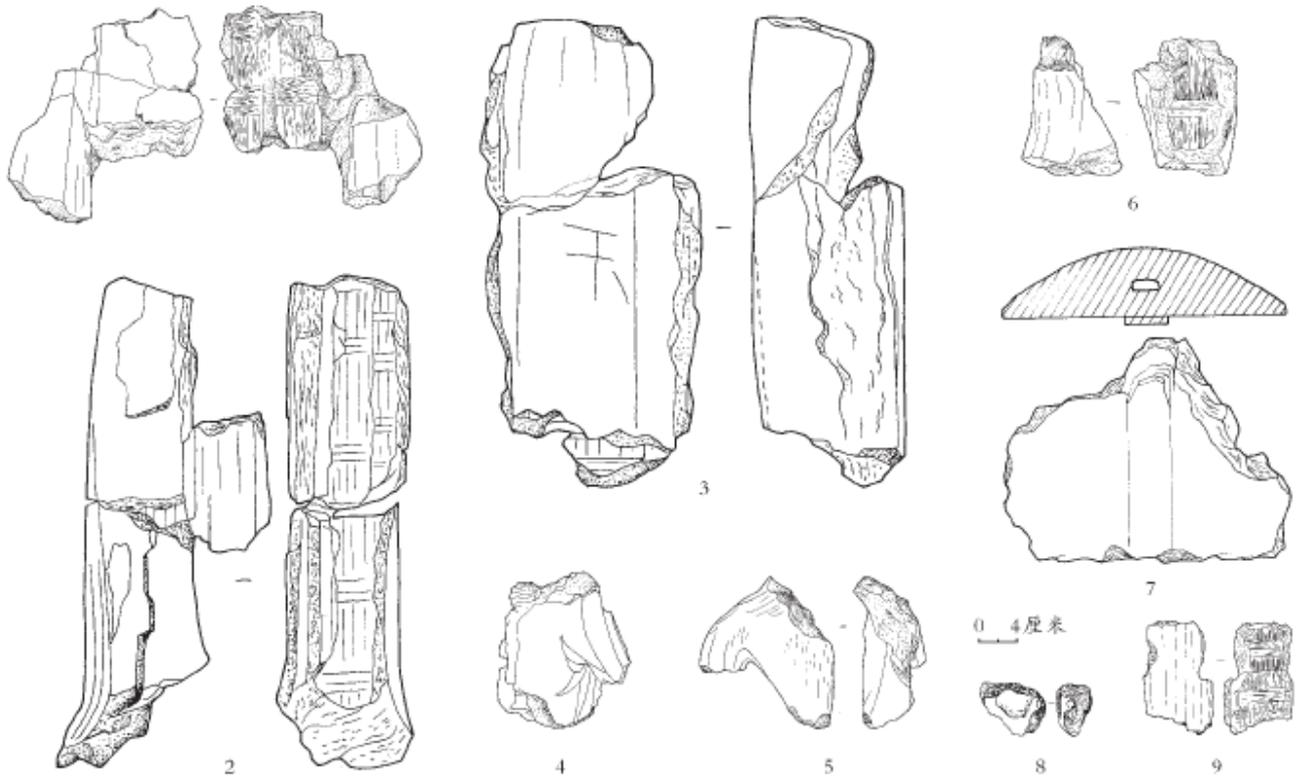
标本 H1:14, 衣纹残块。局部尚存彩绘痕迹。残长 14、残宽 12 厘米(图八:4)。

标本 H1:15, 衣纹残块。局部尚存红、白两色彩绘痕迹。残长 11.8、残宽 9.4 厘米(图八:5)。

标本 H1:23, 衣纹残块。局部尚存红、白两色彩绘及薄黄釉痕迹。残长 7、残宽 5 厘米(图八: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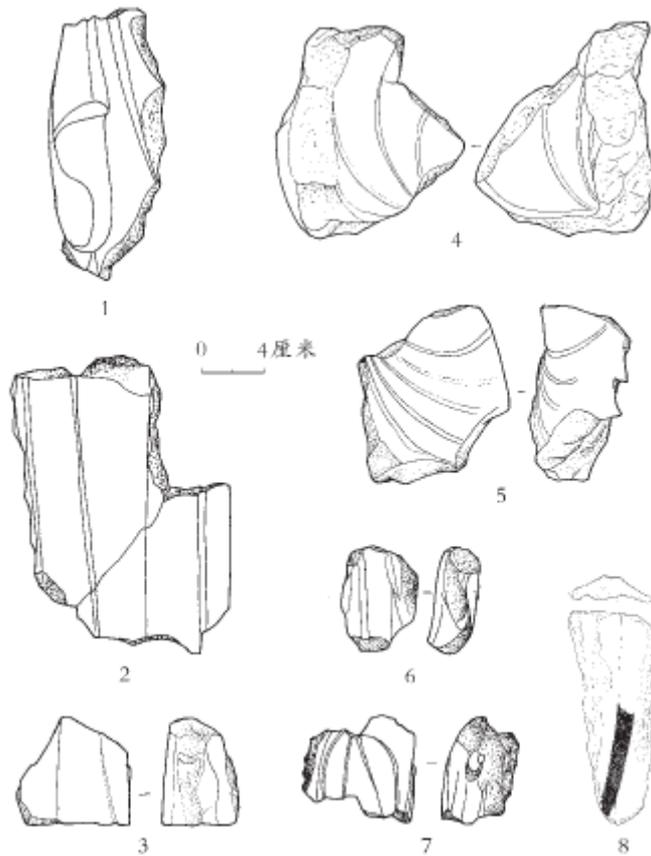
标本 H1:16, 衣纹残块。局部尚存红、白两色彩绘痕迹, 衣纹间见有黑褐釉痕迹。残长 7、残宽 7 厘米(图八:7)。

标本 H1:11, 衣纹残块。局部有红褐色彩绘痕迹。残长 13.8、残宽 5.5 厘米(图八:8)。



图七//泥塑躯体残块

1. H1:6 2. H1:7 3. H1:8 4. H1:2 5. H1:5 6. H1:27 7. H1:25 8. H1:22 9. H1:13



图八//泥塑衣纹残块

1. H1:21 2. H1:10 3. H1:20 4. H1:14 5. H1:15 6. H1:23 7. H1:16 8. H1:11

标本 H1:26, 塑像底座残块。外表见有衣纹痕迹, 局部存红、白两色彩绘痕迹。内腔中有一圆管状芦苇类植物秆茎束扎的芯骨痕迹。残长 14、残宽 20.4 厘米(图九)。

除塑像残件外, 灰坑内还出土少量瓷器残片, 器形有瓷罐、瓷钵、瓷盏等, 多青灰釉, 少量青黄釉, 部分釉层剥落, 典型器有:

标本 H1:33, 瓷钵。敞口, 弧腹, 平底, 口沿下有一周凹弦纹, 内底有轮旋纹。外施釉不及底, 釉层完全剥落。口径 17.4、底径 12、高 5.2 厘米(图十:1)。

标本 H1:39, 瓷钵。仅存残片。敛口, 弧腹, 平底。口沿下有一周凹弦纹。青灰釉(图十:2)。

标本 H1:37, 瓷罐。仅存残片。侈口, 鼓腹, 内外均施青灰釉(图十:3)。

标本 H1:40, 瓷盏。仅存腹部残片。外腹刻划莲瓣纹。内外均饰青黄釉, 开细碎冰裂纹(图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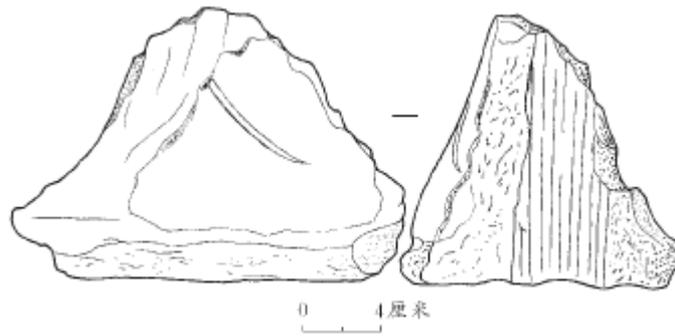
此外, 灰坑内还出土有少量残砖, 多呈砖红色, 仅见一块残青砖。砖有厚 11 厘米和 5.5 厘米两种, 前者砖表不平整, 胎质粗疏; 后者砖表光滑平整, 胎质精细。亦见一些筒瓦、板瓦残片, 瓦片多呈青灰色, 有瓦片互相烧结粘连者, 有过烧变形者, 有与土块烧结

粘连者。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烧结的红褐色土块,土块胎质极粗疏轻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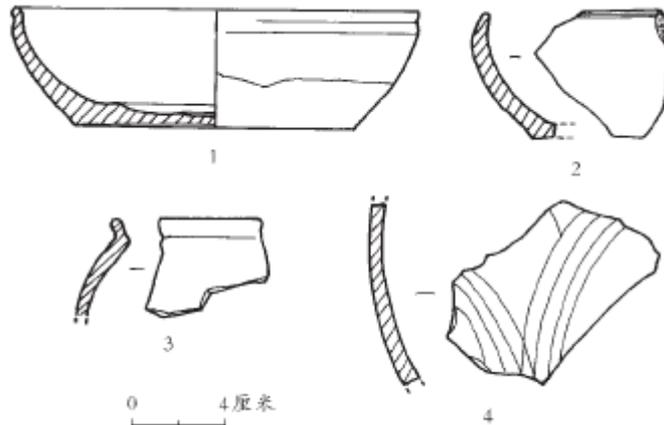
二 泥塑像的时代、制作工艺与奉安场所

出土的泥塑像虽未见准确纪年材料,工作面以上的地层亦在清理前已遭施工机械完全破坏,灰坑、宋井以外的其他遗存也因施工工期未及清理,但塑像出土层位清晰,与之伴出的灰坑内的其他遗物颇具时代特点,如两件瓷钵(H1:33、H1:39)皆为南京地区东晋时期常见器形,一件瓷罐(H1:37)亦常见于近年六朝建康城遗址中的南朝地层,外腹刻划莲瓣纹的瓷盏(H1:40)更是典型的南朝中晚期青瓷器标本。所在灰坑距今地表的深度,参照我们在南京城南地区的考古发掘情况,也应属于六朝地层范围。综此,这批泥塑像的时代可确认为南朝中晚期。

这批塑像均为残件,仅一件头像(H1:1)大体完整,像高 15.8 厘米,按照正常成人身高为头高的 7~8 倍的比例换算,估计其身高在 110.6~126.4 厘米之间,属于比等身像稍小的中型塑像。其他塑像虽皆不完整,但从 H1:3、H1:6 等身像残块大小看,也多属中型塑像,只有 H1:7、H1:8 等个别残像可能属于等身像或比等身像稍大的大型塑像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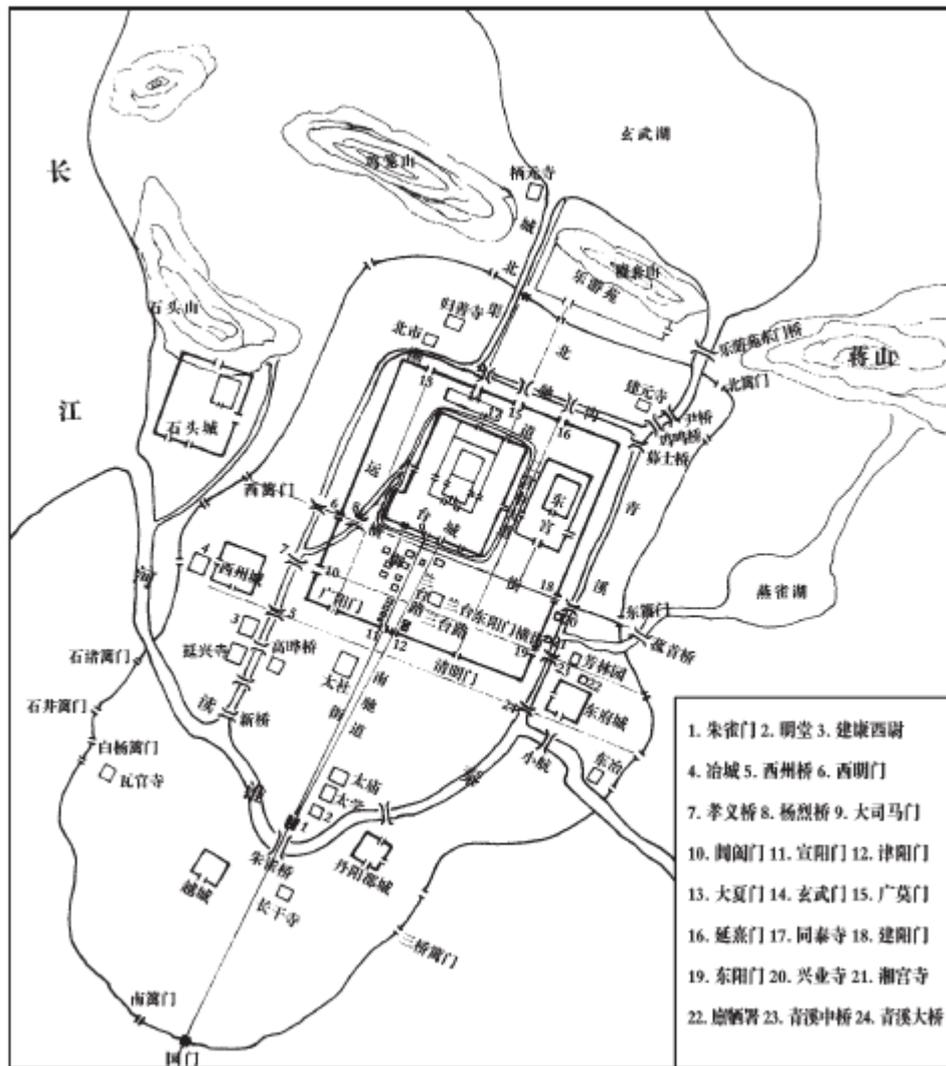
图九//塑像底座残块(H1:26)



图十//

图十//

1、2. 瓷钵(H1:33、H1:39) 3. 瓷罐(H1:37) 4. 瓷盏(H1:40)



图十一//南朝梁代建康城布局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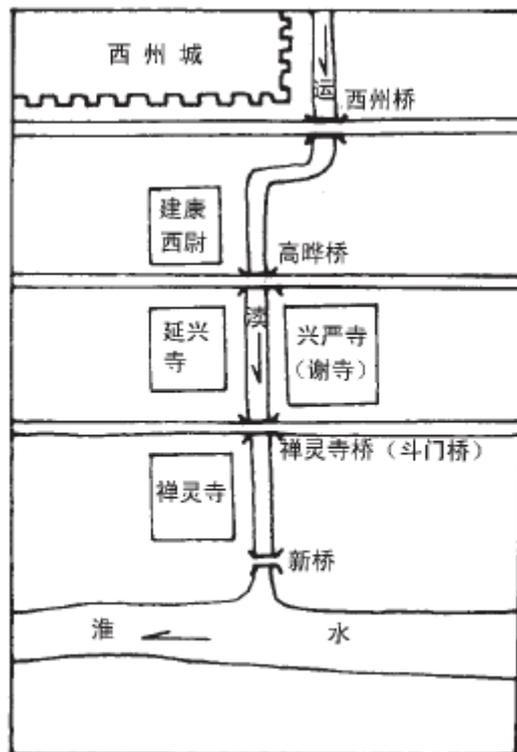
整理发现出土的塑像均为手工捏塑，从残头像(H1:1)、残发髻(H1:9)的制作痕迹看，塑像为身、首分别制作后以方木杆为骨连接，较大型的发髻也是单独塑成后再固定于头顶，甚至连耳部亦为单独捏塑后粘接于头侧。这种分制后再合成的成像方法，既方便塑像的制作，使其细部刻划更加生动逼真，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身像的内腔均有圆形或椭圆形中孔，较大型的身像则有两个相连的中孔，孔径大小不一，凡身像大者则孔径相应较大，反之则孔径相对较小。从孔壁的痕迹判断，其芯骨似用芦苇类植物杆茎结扎成束，芦管径 0.8~1.2 厘米。芯骨外敷泥分内外两层，内层胎胚用泥较粗疏，胎表多不平整，被有意加刻了一道道竖槽，以使内外层敷泥牢固结合；外层敷泥极细腻光滑，厚 0.5~1 厘米，其外再加工衣纹等细部雕饰。因经火烧，外层敷泥多已脱落，而露出内层粗胚。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塑像残件内外都呈烧透的砖红色，与仅因失火烧结的土块不同，前者色泽均匀一致，后者外表红、褐、灰色彩斑斓不一。换言之，这些烧结的塑像不是因为火灾所致，而应是在泥像干燥后入窑烧成。不仅如此，H1:1、H1:2、H1:10、H1:23、H1:16、H1:22 等多件泥像残件外表还清晰见施黄釉、褐釉、绿釉痕迹，釉层虽薄，但很均匀，也不似因火灾或在窑内无意形成，而应是泥像入窑烧固前所施加的一道工序。只是因为胎、釉结合不很牢固，釉层遭火灾变故后大半脱落。此外，大多塑像外表都或多或少残留有彩绘痕迹，色彩有红、白、黑等，惜因遭焚毁，已难睹纹样原貌，甚至连色彩或许也严重褪变了。仔细观察塑像残件，还能发现大部分彩绘和釉层下还加饰一层陶衣，而施釉

处则不再加饰彩绘。要言之,红土桥出土的这批南朝泥像在塑成晾干入窑烧造前经过了施釉、彩绘之妆奁工序。

遗憾的是,由于清理面积有限,特别是因为残毁过甚,这批泥塑造像题材、艺术特征已很难辨认。如后所析,这批塑像原是供奉于佛寺的雕塑品,经与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1]、辽宁朝阳北魏北塔遗址^[2]所出同时代泥塑像比较,红土桥所出残头像(H1:1)、残发髻(H1:9)可能属于供养人形像,而残身像之衣饰特征皆难究明,故其身份难以确认,但不排除其中如 H1:7、H1:8 等较大塑像为佛像或菩萨像残件的可能。

关于发现塑像地点的性质,虽然出土遗物中没有确凿的文字材料,但所幸文献记载中有相关重要线索。《建康实录》卷二在介绍六朝建康城西南所行之古运渎时称:“运渎旧有六桥:孝义,本名髡子桥。次南有杨烈桥,宋王僧达观斗鸡鸭处。次南出有西州桥,今县城(唐江宁县城)东南角路东,出何后寺门。次南有高睥桥,建康西尉在此桥西,今延兴寺北路东度此桥。次南运渎临淮有一新桥,对禅灵渚渡,今之过淮水桥,名新桥,本名万岁桥。”^[3]记载中的运渎西岸、高睥桥南的延兴寺正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者。《建康实录》卷八注引《寺记》又云延兴寺为东晋康帝时所置两所佛寺之一:“帝时置两寺:褚皇后立延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沟西岸;中书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废也。”^[4]《比丘尼传》卷一进一步指明延兴寺为建元二年(344年)所创尼寺,具体地点在都亭里运巷内:“建元二年,皇后褚氏为(尼僧基)立寺于都亭里运巷内,名曰延兴。基居寺住,徒众百余人。”^[5]延兴寺与谢寺隔运渎相望,《建康实录》卷八云:“(晋穆)帝时置僧尼寺三所:何皇后寺,在县东一里,南临大道。彭城敬王造彭城寺,在今县东南三里,西大门临古御街。镇西将军谢尚造谢寺,今改名兴严寺,即延兴寺东隔运沟东岸也。”^[6]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又云:“(建康)西尉在延兴寺后巷。”综而言之,延兴寺在六朝建康城西南运渎西岸、高睥桥南,北有建康西尉,东与谢寺(兴严寺)隔运渎相望^[7](图十一、十二)。



图十二//延兴寺位置示意图

六朝时期的运渎是一条南接秦淮河,东北达建康宫城(孙吴苑城、东晋南朝台城),承担着建康都城和宫城物资运输的重要人工水道。《建康实录》卷二载:孙吴赤乌二年(240年)“十二月,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其下

注云：“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仓，名曰苑仓，故开此渎，通转运于仓所，时人亦呼为仓城。”^[8]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桥梁》云运渎六桥之一的高晔桥在宋代“乾道桥左右”，又云乾道桥有南、北二桥，“在古运渎上，今斗门桥北二桥相望”。至清代，南乾道桥改称红土桥，北乾道桥改称草桥^[9]，而斗门桥或讹称陡门桥。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即云：“运渎水自斗门桥北流至红土桥，再北过草桥而西折焉。”^[10]运渎故道因其上六桥自宋代以来历历可考，所在线路古今皆无多大分歧，且其下游至明清时期仍为城内水路交通之一部分。清末以后，因民居侵占、疏于浚治，运渎才逐渐湮塞。民国末年，斗门桥至草桥一段河道竟填为平地。今鼎新路南段即因运渎故道及其西侧甘雨巷拓宽而成，而红土桥则约在今安品街与鼎新路交汇处^[11]。出土南朝泥塑像的建邺区国税局正在古运渎之西岸、红土桥（乾道南桥，即古高晔桥附近）之南^[12]，与前述记载中的延兴寺位置完全吻合，故这批泥塑像应是南朝延兴寺供奉礼拜之物无疑。

因迄今所见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内蒙古包头固阳北魏寺院、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河北邺城东魏北齐寺院、辽宁朝阳北魏思燕佛图等北朝寺院遗址中出土的泥塑像均发现于木塔址，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泥塑像原来应奉安在位于佛寺中心的木塔内部的佛龕中，以供佛教徒进行礼拜^[13]。延兴寺内有无木塔因史料记载阙略，不得而知，但从当时南朝佛寺普遍设塔的情况推测，寺内有木塔的可能性的确很大，而出土的泥塑像原来或许就安放在木塔之中。然而根据佛教典籍记载，奉安佛像之所也可能是佛寺中各类“殿堂”、“高堂”、“佛殿”等建筑，故红土桥所出泥塑像也不能排除原供奉于延兴寺内殿、堂的可能^[14]。

众所周知，南朝佛教极度兴盛，举国溺信佛陀，作为一国之主的梁武帝竟三次舍身同泰寺，把佛教的传布影响推向了顶峰。当时都城建康及其周围梵刹林立，全盛时达700余所，仅郭内大寺即达三百余所^[15]。这些佛寺所遭毁灭性破坏主要有两次：一次为梁末侯景之乱，《法苑珠林》卷一〇〇引《舆地图》云：“梁武都下旧有七百余寺，属侯景作乱，焚烧荡尽。有陈既统国及下人，备皆修葺，表塔相望，星罗扬犖，经像之富，不可殫言。”^[16]《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亦云：“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荡以尽，自（陈武）帝登极悉令修复。”^[17]一次为隋灭陈后，建康遗民为寇，乱平之后，寺宇荡尽。《国清百录》卷二载隋晋王杨广答智凯蒋州事书云：“弟子总持和南，爰逮高旨，腾蒋州僧所及。窃以僧居望刹，食惟分卫；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斯亦智者各所明见。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彼地福尽，方成丘墟。”^[18]前次毁寺因有陈武帝修复，时间短暂。后次则为彻底夷平，再无兴复。故《南朝佛寺志》卷上“延兴寺”条即认为该寺“隋时废”。

今红土桥出土的南朝泥塑像焚毁痕迹明显，同时伴出的遗物中火烧变形的泥块、瓦片比比皆是，都是曾经遭受火灾破坏的明证。这场大火很可能就发生在隋初。清末民初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在记红土桥名由来时云：“尝有掘地深三尺者，见其下土色皆红，而知见称之由，盖冶麓之余气焉。”即认为红土桥旁地下所见红土乃因附近冶山（古称红土山）余脉所在。其实，从我们近年在红土桥周边其他多个建筑工地的考古发掘情况看，这些工地地下并未见这种红土。所以红土桥旁地下“土色皆红”不可能是因冶山余脉所在，而如前析，当时所掘之地可能即在延兴寺遗址之上，所谓“土色皆红”者，乃系被焚毁后的延兴寺址上遍地皆是红烧土块。

三 与百济泥塑像制作工艺技术传统的一致性

红土桥出土的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是南朝时期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19]，然与其时代相当的北朝佛寺遗址却屡见此类塑像出土，见诸报道者主要有：1979年，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塔基周围地层出土各类泥塑残像1560余件^[20]；1979~1980年，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被推定为北魏六镇之一怀朔镇所在的城圜圖古城寺院遗址出土彩绘泥塑残像36件^[21]；1981年，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塔基回廊的四周及佛殿出土佛教题材的彩色泥塑像残块16件^[22]；1986年，辽宁朝阳北塔塔基遗址周围出土与北魏思燕佛图有关的泥塑残像1670余件^[23]；2002年，河北临漳县赵彭城村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发现泥塑彩绘佛像和各式泥塑彩绘残件^[24]；此外，198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北魏云中镇城址内也出土有与包头固阳城圜圖城址造型相似的泥塑残像^[25]。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遥远的朝鲜半岛西南端三国时代百济国10多处佛寺等类遗址也先后发现众多泥塑像残件。据介绍仅属泗泚期的遗存就有扶余定林寺遗址、扶余陵山里寺址、扶余旧衙里遗迹、扶余旧桥里遗迹、扶余临江寺址、青阳汪津里窑址、

扶余扶苏山废寺址、恩山金刚寺址、青阳本义里窑址、益山王宫里帝释寺址废弃场、益山弥勒寺址等^[26]。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定林寺遗址,不仅寺址经过了比较全面的考古发掘,清晰揭露出其平面前塔后殿、殿后设讲堂、周绕回廊的布局,而且寺院回廊内西南隅等处出土的佛像、比丘像、世俗人像等各类泥塑残像至少达 80 余件,其保存相对完整之头像、衣饰特征较为明显之身像的数量都远较其他地点为多,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7]。

以上出土的这些北朝和百济泥塑佛教造像,近年已引起中、韩两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其造像风格及其渊源、内容题材、制作工艺、传播路径、安奉场所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29]。特别是关于洛阳北魏永宁寺址与扶余百济定林寺址的比较,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定林寺发现的泥塑残像与永宁寺出土的泥塑残像的造型乃至大小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共同特征,而在寺院的平面布局上,虽二者都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寺门、佛塔、佛殿,同为前塔后殿之布局,但定林寺佛殿后设有专供讲经的讲堂,而永宁寺却未见殿后讲堂之设,因此认为百济定林寺是仿效当时南朝佛寺修筑而成,甚至定林寺之名也很可能仿自南朝都城建康钟山名刹上定林寺,而两者泥塑像艺术造型应是同受同一来源即中国南朝的影响^[30]。但是由于南朝都城建康佛寺遗址迄今未作正式考古发掘,泥塑造像过去也未见实物资料,以上认识还只是根据文献记载所作出的推测,留下一定的缺憾。

红土桥出土的南朝泥塑像因过于残毁,故在造像内容题材、样式风格上难以与同时期的北朝和百济实物资料进行具体比较,但通过塑像残件的遗痕所揭示的三者之间制作工艺的异同却颇耐人寻味。

首先,三者的塑像都是身、首单独制作,然后以木杆等相结合。身像的内腔都以植物杆茎结扎成束作为芯骨,只是以永宁寺塑像为代表的北朝塑像植物杆径较小,红土桥南朝塑像似为杆径较大的芦苇,而以定林寺、益山帝释寺废弃场为代表的百济塑像的芯骨植物杆径似处在前两者之间^[31]。这应是三地就便取材的缘故。

其次,三者的塑像外表都有红、白、黑等色彩绘,都因佛寺火灾焚毁而烧结,但以永宁寺、朝阳北塔为代表的北朝塑像烧成温度不高,胎体内外烧结程度有别,胎体内外及器表各部位呈现灰、红色差较大。而红土桥南朝塑像和以定林寺、帝释寺为代表的百济塑像则烧成温度较高,内外烧结透实,胎体内外及器表各部位呈色基本一致。前者显然是因火灾焚烧所致,后者烧结程度之高决不能仅归因于火灾焚烧,而应是泥塑成像后入窑烧造而成。只是红土桥南朝塑像内外胎体均呈颜色一致的砖红色,而定林寺、帝释寺塑像胎体似以灰色为主,这可能主要是因它们在氧化或还原的不同窑室气氛中烧成引起。青阳汪津里、青阳本义里两处百济塑像都出自窑址,就更为我们上述推测提供了可靠的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土桥南朝塑像和定林寺、帝释寺等百济塑像应称作陶塑像才是。

第三,红土桥出土的南朝塑像中不少标本胎表都遗有一层薄釉,只是因为胎、釉结合不牢而釉层大多剥落。相似现象亦见于定林寺^[32]、扶余旧衙里^[33]等遗址出土的百济泥塑像残件,所见釉彩有黑、黄、绿、黄褐等色。但前述诸北朝泥塑像胎表皆未见施釉现象,显示出其间制作工艺的明显差异。

概而言之,从制作工艺角度观察,红土桥南朝泥塑像与百济泥塑像、北朝泥塑像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这既是三者共同的时代特点,也反映出其间内在的联系。更需重视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红土桥南朝塑像与定林寺等百济塑像皆经入窑烧固,入窑前还均作了施釉处理以装饰塑像,属于同一制作工艺技术传统无可置疑,而前文列举的北朝诸塑像皆未发现如上现象^[34],应该属于另一制作工艺技术传统。

定林寺等百济泥塑像与红土桥南朝泥塑像制作工艺技术传统的一致性,显然是百济佛教文化深受中国南朝影响的结果。据《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第二》记载:百济枕流王即位当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秋七月,遣使入晋朝贡。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中礼敬焉。佛法始于此。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从文中同年七月遣使入晋,九月胡僧由晋至国的情况看,似乎胡僧是随百济国使入国,那么摩罗难陀就有可能受东晋政府的派遣。此为百济佛法之始。此后,佛教在百济上好下化,渐次昌隆。至梁代,随着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日益密切,百济从佛教已高度发展的梁代学习借鉴佛法尤勤。《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云:百济圣王十九年(梁大同七年,541年),“王遣使入梁朝贡,兼表请《毛

诗》博士、《涅槃》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从之”^[35]。亦有百济僧人入梁问道求法。《法华经传记》卷六载:“百济沙门释发正,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问道,颇解义趣,亦修精进,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归本土,发正自道闻他说。”^[36]乃至大通元年(527年),百济圣王在国都熊川(即熊津,今公州)为梁武帝创寺,名大通寺^[37]。然当此之时,百济却长期未与北魏建立外交关系。盖鹵王十八年(北魏延兴二年、刘宋泰豫元年,472年),百济首次遣使北魏乞师讨伐高句丽遭拒后,“(盖鹵)王怨之,遂绝朝贡”^[38]。此后,百济开始执行完全一面倒的外交国策,在东城王、武宁王、圣王三王时代(479~554年),彻底断绝与大陆北朝诸政权的外交来往,而仅向南朝建康的齐、梁政权朝贡。直到圣王之子威德王执政期间(554~598年),才逐渐建立起与北齐、北周和隋诸北朝政权的朝贡外交关系^[39]。在此时代背景下,以定林寺为代表的百济泥塑像之制作工艺技术传统接受南朝影响,而与迄今发现的诸北朝泥塑像制作工艺技术传统迥然有别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我们已知,大同七年(541年),梁武帝曾敕给百济《涅槃》经义及工匠、画师等。因韩国公州发现有属于典型“建康模式”的百济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等砖室墓葬,一般认为前往百济的南朝梁代匠师中应有筑墓工匠^[40]。本文揭示的百济与红土桥南朝泥塑像制作工艺技术传统的一致性,使我们进而怀疑由南朝而来的工匠、画师也可能介入了包括泥塑像制作在内的百济佛寺的营建。南朝佛教文化对百济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可能超乎我们以往的想象。我们相信,随着南京地区南朝佛教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将会有更多的实物材料来证实以上推断^[41]。

参考文献:

[1][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2][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3]唐·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

[4]唐·许嵩:《建康实录》第209页。运沟即是运渎。

[5]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06年,第23页。又《大正藏》第50册梁·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云:“建元二年,皇后褚氏为立寺于都亭里通恭巷内,名曰延兴,基居寺住,徒众百余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之《高僧传合集》所附之《比丘尼传》卷一则记:“建元三年,皇后褚氏为立寺之都停旦运巷内,名曰延兴。”第964页。按东晋康帝建元年号仅有二年,此误。又“都亭里通恭巷”、“都停旦运巷”应是“都亭里运巷”之讹误。《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街巷》即云:“运巷,在今天庆观(即今朝天宫)相接。沈约《自序》曰:‘王父从宦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都亭里之运巷’。《世说序录》:冶城在今运巷东旧里亭。今俗呼黄泥巷。”《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二·街巷》则引“戚志云(运巷)当临运渎”。可以为证。

[6]原文标点为“镇西将军谢尚造谢寺,今改名兴严寺,即延兴寺,东隔运沟东岸也。”误,兴严寺(谢寺、谢镇西寺)与延兴寺为两寺。参见唐·许嵩:《建康实录》第228页。

[7]《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桥梁》“运渎六桥·高晔桥”条引《建康实录》云:“建康西尉在此,今建兴寺北路东出度此桥(高晔桥),宜在今乾道桥左右。”《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桥梁》“运渎六桥·高晔桥”条亦引《建康实录》云:“古建康西尉在此桥(高晔桥)西,建兴寺北路东出度此桥,宜在今乾道桥左右。”按:据前引《建康实录》卷二、卷八记载,二志中“建兴寺”乃“延兴寺”之误。

[8]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第45页。

-
- [9]夏仁虎:《秦淮志》第三卷,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 [10]运渎在草桥北东折后循今木料市以东北行,故此应为“再北过草桥而东折”。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金陵琐志九种》,南京出版社2008年。
- [11]今红土桥虽已不存,但周围居民仍习惯将鼎新路中段一带称作红土桥。
- [13][韩]梁银景:《朝阳北塔出土泥塑像的渊源及奉安场所探讨》,刊《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2008年12月。
- [15][16]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一〇〇,中华书局2003年,第2891页。
- [17]宋·释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大正藏》第49册。
- [18]隋·释灌顶撰《国清百录》卷二,《大正藏》第46册。“总持”为晋王杨广从智凯受菩萨戒后所名法号。
- [19]据贺云翱《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出土瓦当初探》(《东亚考古论坛》创刊号,韩国(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5年)一文,2001年至2002年,位于南京钟山南麓的南朝时期二号寺遗址曾出土一件小型陶塑残佛像,但此塑像的详细资料迄今尚未正式公布。2009年春,承贺云翱教授美意,笔者曾随到宁访问的韩国考古学者一起考察了此塑像。
- [21]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白灵淖城圜圃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期。
- [22]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
-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3年第10期。
- [2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 [26][韩]李炳镐:《扶余定林寺址出土泥塑像的制作技法与奉安场所》附表二,[韩]《美术资料》第七十二、七十三号,国立中央博物馆2005年,第64页。
- [27][韩]尹武炳:《定林寺址发掘调查报告书》,忠南大学校博物馆、忠清南道厅,1981年。
- [28]本表参照前揭李炳镐《扶余定林寺址出土泥塑像的制作技法与奉安场所》附表二及梁银景《百济扶苏山寺址出土品的再检讨与寺刹的性格》附表一改制。
- [29]参见前揭梁银景、李炳镐文;钱国祥:《北魏洛阳永宁寺塑像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
- [30]杨泓:《中国南朝对百济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文物报》2009年2月20日及2月27日第7版;杨泓:《百济定林寺遗址初论》,《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庆祝邓广铭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1] [韩]圆光大学校博物馆、益山市：《益山王宫里传瓦窑址(帝释寺废弃场)试掘调查报告书》，《博物馆学术丛书》第 23 册，2006 年。

[32] 参见前揭定林寺发掘报告及李炳镐《美术资料》第七十二、七十三号文。

[33] [韩]李炳镐：《扶余旧衙里出土塑造像及其遗迹的性格》，刊《百济文化》第三十六辑，公州大学校百济文化研究所，2007 年。

[34] 山东境内的东魏、北齐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陶塑像。所知有两例：一例为 1976 年博兴张官大队龙华寺遗址出土一批北朝佛像，其中有多件素烧陶造像，见常叙政、李少南：《山东省博兴县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 年第 7 期，该文中称这些素烧像为“模印白瓷素烧”像，然刘凤君著《山东佛像艺术》一书第 62 页则云为“模印素烧”像，文物出版社 2008 年；一例为 1996 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大型佛教造像窖藏中发现少数陶塑和彩塑泥质造像残件，见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 年第 2 期。山东地区因与南朝疆域接壤，境内北朝佛教文化深受南朝影响，寺院遗址发现与南京红土桥类似的陶塑像不足为怪。然因有关材料报道简略，具体情况难明，聊记于此，俟机详考。

[35]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百济》亦载：“中大通六年(534 年)、大同七年(541 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

[36] 《法华经传记》卷六，《大正藏》第 51 册。

[37] 《三国遗事》卷三载：“又于大通元年(527 年)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注云：“熊川即公州也。”

[38] 《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

[39] 王志高：《韩国公州宋山里 6 号坟几个问题的探讨》，《东南文化》2008 年第 4 期。

[40] 王志高：《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东亚考古论坛》创刊号，韩国(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 2005 年。又收录于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